



钟怡雯



张依苹



温任平



黎紫书

文化胎记与本土特点:

马华文学的双重传统

□陆士清



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怎样?对这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对世界华文文学开始研究的初期,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比如有人认为这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中国文学是中心,世界华文文学是边缘;有人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延伸,是躯干和枝条的关系;有人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就是华侨文学,是侨民落地后的文化现象。有这样看法的人是少数,观点本身也比较模糊,且并未有见诸文字的正面阐述。绝大多数学者并不赞同这些看法,而认为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血肉联系,但它不是中国文学,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原有的华侨文学特点逐步消解,而演变成了所在国的华文文学,但不一定是所在国的国家文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发展,已产生了“双重传统”,当今我们必须建立起“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这样才能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的重要性,所谓的“双重传统”即是“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华文文学传统”。

这些观点的提出,应该说是华文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从积极的方面看,它的意义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厘清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有助于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同是用华语写作,它们之间有血肉的联系,但世界华文文学虽必然含有中国文学传统因素,但它还有本土华文文学发展、孕育和积累的传统。二是更能准确认识中国本土以外的

华文文学的意义和重要性,使研究者和评论者更自觉地别具眼光地把握其所具有的本土质素,揭示其特点,显示华文文学世界的多姿多彩。

三是能使华文文学创作在自由地延续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更为自觉地探视体现本土特点,建构本土华文文学传统。当然传统是在长期积累中自然形成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而“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是可能的。然而当这种“有心”成为所在地创作群体的潜意识时,它就能开花结果。这其中,新马文学创作的业绩就是证明。

本土马华文学传统的基本特点

从现实的情况看,凡有一定数量华人群体居住的国家或地区,都会衍生华文化,也会产生华文文学创作;但是,既延续了中华文学传统,又初具本土华文文学传统的,目前可能只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的华文文学。新、马本来是一家,也就是马来亚文学。1965年新马分家后,文学也花开两朵。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包括新、马分家前的马来亚文学)的发展,历经了近百年风雨,文学运动一个接一个,文学思潮一波盖一波,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出版了数百部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事实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马华文学文库,从而使马华文学的确立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马华文学概念的确立,“经典”固然重要,但量的规模同样重要,甚至是基础。何况经典的认定虽然可以有当代的参与,但它更有赖于历史。历史的波涛将汰洗去砂砾,挤去泡沫,让真正的金子发光。

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新马文学还具有很浓重的华侨文学特色,之后本土特色日益浓厚了。如为方北方带来声誉的长篇小说《风云三部曲》,是他中国情结的艺术之花,而《马来亚三部曲》,则是马来西亚华人奋斗和发展史的艺术再现。尽管对《马来亚三部曲》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评价,但也许这是马来西亚(马来亚)华文文学本土化开始的标志之一。也可以说是马华文学在延续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对本土华文文学传统建构的肇始。此后各年代作家也都自觉与不自觉、情愿与不情愿地沿着这种双重传统的道路走下来。走到今天,中国文学传统依旧在演绎,而本土特点的色彩则越来越浓厚,本土传统也在逐步的积累中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基础。马华文学本土传统的基本特点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是国家认同。马华文学已经从政治身份上认同中国转变为认同马来西亚,也即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国家的公民,而不是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他们已有了这样明确的认知:中国是我们华族的民族之根、之母;但马来西亚则是我们的祖国。

二是价值认同。所谓价值认同,即是人们对自身利益、需要和行为取向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人也许不可能有绝对的鸿沟,比如在中华民族生存和中华民族文化遇到巨大挑战的时候,马来西亚华族,特别是华族的精英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选择上,在无法双赢的条件下,他们要维护的必然是马来西亚,而不是中国。这一核心价值的认知,也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取向。

三是拥抱生存的土地,珍爱事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人移居马来亚的历史,也

许要追溯到郑和时代,数百年来,特别近百年来,他们在这片热带雨林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也是这片土地给了他们事业发展的空间,乃至成就了他们的事业。也许他们对遥远的中国故乡仍有着亲情的记忆和某种牵挂,但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才能真正掀动他们痛痒相关的心潮吧。

四是不同的追求和梦想。中、马两个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同,人口种族情况、疆域大小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也不同。中国人和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梦想和追求也许会有某些交汇点,比如希望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真正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希望中华文化能再现历史的辉煌等;但是希望和梦想总是与所处的环境伴生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渴望,马来西亚华人有自己的焦虑,也必然有自己的梦想和追寻。

五是自然风土、人文环境的不同。热带雨林的土壤、橡胶树、椰子林、油棕桐……所构成的椰风海韵和它所衍生的传说;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杂处所形成的多色彩的人文环境,以及由此所构成的华文文化和华文文学,无论是外在风貌和内在形态,都必将是自成一格的。

继承和演绎中国文学传统是必然的

本土华文文学传统的开始建构,是否意味着不再演绎甚至摆脱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呢?回答是否定的。尽管关于要不要继承和演绎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问题,在马来亚华侨文学向马来亚华文文学和后来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转变的过程中,是有争论的,有的口号提得很极端;但华文文学创作很难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切割。华人如尚未被别的种族和民族完全同化,说汉语,写方块字,就有民族记忆,就承载着中华民

族数千年来文化积累,在主体上就是由中华文化养育的。用马华作家的话说,中华文化是自己的胎记,是洗不了、刮不去的血肉。如果作家用华文创作,就必然要调动和运用汉语思维的整个机制,包括汉语概念范畴和思维方法,并受到它的规范。作家也必将运用汉语中所积累的浩瀚的文化、文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对所写的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愫进行概括或者抒发,创出新境。离开积累了极为丰富文化、文学资源的汉语这个中国文化的根本元素,要进行华文创作,是不可想象的。相信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华文作家要求和愿意做这样的切割。相反,一切有成就的华文作家,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创造的灿烂文化、文学遗产和崇高的文学精神,是深怀崇敬之情的。也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光辉和文学精神的照耀和召唤,才令他们倾情于华文文学创作,走上新传民族文化之路。至于说到与中国文学的不同,也不过是在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或者是与中国大陆某种文学思潮问题上的区分而已。华文文学在建构本土传统的同时,也必然会继承和演绎着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

双重传统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

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创作情况看,马华文学确已初步建构了华文文学的本土传统,今后的任务是如何使本土传统得以进一步发展。在笔者看来,这有待于产生如李有成、李永平、张贵兴、商晚筠、黎紫书、温任平、李天葆、钟怡雯以及张依苹等新锐作家(尽管这些作家中有些人已落籍台湾,但大马仍将他们视为马华作家);有待于产生更丰富的作品,特别是反映本土多民族生活的史诗般作品;有待于文学批评的繁荣,以及马华作家对本国华文文学发展历史较为客观的梳理,为马华文学教育提供较为丰富和精当的资源;还有待于国际

华文文学的交流发展,特别是与中文母国——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文学的交流,从而在华文文学世界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和特殊的光芒,也从世界华文文学中汲取营养。

而所有这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则是,要培植好华文和华文文学的教育。目前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汉语等,但“精英”而不“精华”,在这个华人占人口总数77%的国家中,华语的应用和华文的传播受到影响和限制,说华语的家庭正在急剧减少,某些抱有优越感的新加坡人甚至认为在国际会议场合用华语发言是“老土”。华语不受重视的情况不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华族的华语水平将会下降。语言的创造力也会衰竭,整体文化氛围对产生杰出的作家是不利的。马来西亚华人约有600万,占国家总人口1/4,但华语也不是官方语言。早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还比较宽松,华文媒体在弘扬华文文化上也不遗余力,造成了较好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作家,但是现在,华语学校在马来西亚也出现了生存艰难的状况。

前不久马来西亚巫统国会议员慕克力称,全国小学都将成为以马来文为媒介语的学校。马历史学家邱家金更是宣称华人应放弃母语教育。他们的主张虽然遭到了马华、马青、妇女会的批评,马来西亚的副首相也出来灭火,但要终止华校小学华语教育的意图是明显的。同时,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华文中小学都没有政府资助,中学生上华校,必须支付不菲的学费,这对扩大和提升华文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而多数马来文学校是不将华文编入正规课程的,学生要学华语就得自习或补习。由于顾虑影响官方考试,有些家长也不鼓励孩子学华语。当然,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程中,世界华文文学,包括马华文学这棵生命之树将会生生不息。这是可以期待的。

海外华文文学的前沿问题和诗学建构新思考

□庄伟杰

作为一个华文写作者,当自己把孤魂流放于南半球,漂泊、流散、身份焦虑、文化认同、跨境书写等字眼便会成为一系列关键词。于是,在来去家园的羁旅途中,面对或倾听着在非母语的异域用母语来表述自身诉求和生命渴望的声音,自然产生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远行的沧桑经历和深刻的生命体验,驱使我自觉地把关注点转移并驻于海外华文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所打造的文学风景线,笔者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其意指置身海外的华文作家,他们处在民族性与开放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由是而派生出另类的文化空间——“第三文化”。既不愿丢弃自身的文化意识或中国形象,又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居住国主流文化的现实,这便是“第三文化”产生的主要根源。

作为全球化时代流散族群及其写作研究的一个领域,海外华文文学有其先行性和前沿性,其审美范式为我们从新视角来认识与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那么,“华文文学”这个带有整合性的概念(命名),到底是从何时、在怎样的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对于关心华文文学学术发展的批评者来说,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问题,尽管“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命名,有着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背景。然而,重新命名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其实,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在海外很早就开始了,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引人关注的是,从1989年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到蝉联两届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亚裔系举办的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的华文学国际研讨会,直至2006年春由王德威主导的哈佛大学东亚系举行的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都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中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地域、族裔、社会、

性别的移动与转化、华裔子民移徙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和世界想象等等,并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回眸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批评研究现状,我们大体可以看出:

首先,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其次,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批评研究往往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究其原因在于“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来的学科背景。但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批评研究成为一种“不完整”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应是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其获得独立生命的价值所在。再者,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学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其四,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文化都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是侧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话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则提出自身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进行“放弃”和“寻找”。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传承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海外学者审视得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其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且渐趋多样化。早期多以传统的历史学、社会学批评方法,显得单调或缺乏深刻独特。而今,引进如主题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

文化研究相结合,还有身份认同、创作心理、叙事策略研究与新批评方法相结合等,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随着年轻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影响到华文文学批评研究学术质量和层次的提升。

鉴于此,针对华文文学批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对走向新世纪的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挖掘出其中潜在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在跨境书写中发生的流变与重构,尤其是对某些值得关注的基本话题和前沿性理论问题加以探讨和辨析,显得非常迫切。譬如,如何梳理描述华文文学的特质与文化属性、文化版图与场域;如何思考华文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前沿理论问题,从跨文化视野中观察华文文学的最新动态;如何在突显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对诸多前沿学术问题进行辨析,指出当下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如何从多重侧面切入,着重探寻流散异域的华人,在跨境书写中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既有故园想象与根的意识,也有异国情调与异族叙事,阐释这种写作介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既可与本土文化对话,又带有文化混杂性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中;如何以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和文学文本为例,对包孕其中的诗学内涵和文本意义进行价值判断,并对华文文学所蕴含的美学形态加以描述等。同时应将视线转移到海外华人学者在感受中西文化差异之后所作的“回望”本土文化文学和诗学的研究成果,及其对于“扩展汉语文学和文化诗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与存在意义上。例如,对李欧梵的“现代性”研究、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命名、王润华的“华文后殖民文学”理论、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观、叶维廉的“中西比较诗学”论等进行考量和解读,从海外华文作家和华人学者在汇通中西文化所显示的姿态和经验,揭示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诗学思想。可见,怎样运用文艺美学、比较文论、文化诗学、后殖民理论等前沿理论和方法,触及中西差异与互动、语境与文本、审美与文化表述等日益引起华文文学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样必不可少。此外,注重宏观透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遵循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以体现其历史轨迹和整体风貌,突显出诗学对于具体作品的穿透,充分认识到新世纪华文文学发展所依存的多元文化语境,以便找到其发展规律和特点,等等,都是我们亟需努力深化和拓展的重要课题。

《当代台港文学概论》:

从个性化学术角度还原文学史

□孙 婧

古远清的《当代台港文学概论》(2012年3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从文学、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考察台港文学,在此基础上以“私家治史”和消解边界的意识界定并梳理了台港文学从1949年到2010年的发展。作者将大陆文学的主体性放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里,提出:“以文学史证明台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重任,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当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连”。

该书从个性化学术角度确立了台港文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着自我的体系、框架和见解。该书主体从台港文学思潮、小说、散文、新诗、通俗文学、戏剧等艺术门类中对代表作家作品进行梳理研究,跳出了传统教材“寂寞冷清”的写法,以“故事”还原作家品评,力求客观,通过文本分析显示了台港文学在文本品格等多方面的交迭、冲突以及互为唱和的现象。

在书中,作者力图以“有故事”的文学史引导阅读。在生动的标题当中穿梭作家的生平故事,以历史的角度还原真实的作家。如广东籍香港作家金兆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先君遗像》《芒果的滋味》《考试的风波》等可读性都很强,以人物“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了“文革”对人的心灵创伤,在之前的台港文学史中罕有介绍,在《当代台港文学概论》中,则对金兆做了详细介绍。作为香港文学拓荒者的伯乐,作者用“底层写作”来对其解读,认为其是“内地以外写底层经验、为弱势群体发言的典范”。作者以其自觉的民间立场对作家作品进行审视和判断,一方面,这样的解读契合了当下大陆“底层写作”的文学现实,另一方面也填补了文学史表述的区间化倾向。另外,作者将朱西宁、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引领的台湾文学家族命名为“朱氏小说工厂”,回到台湾的文学语境,这种解读也令人耳目一新。



马来西亚画家叶健仪作品

HUA XIN